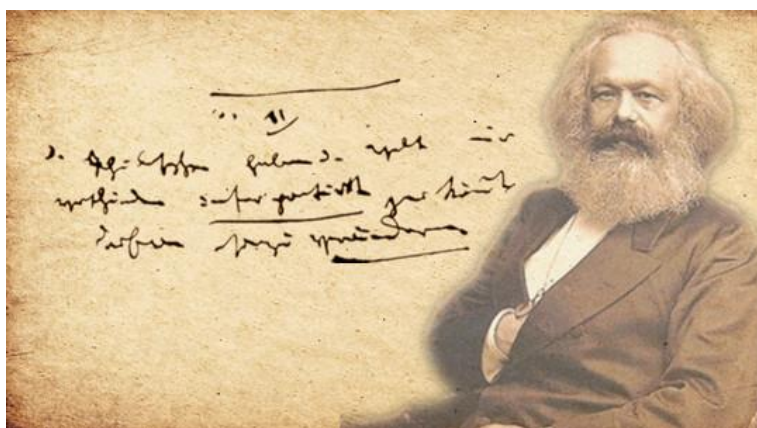


# 历史唯物论与东方革命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2018 年 3 月 14 日)

高 寒



## 摘 要

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是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之于马克思主义，犹如牛顿定律之于经典力学，相对论之于爱因斯坦学说。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其它理论的关系，是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次级理论或应用理论，当其用唯物史观来阐发时，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其一旦脱离唯物史观，它们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就会变得模糊起来，甚至与马克思主义无缘了。离开历史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是其他任何理论，却绝不是马克思主义。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历史唯物论经受住了正反两个方面实践的考验。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东方共产党人与西方共产党人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因其所处于完全不同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在东方革命上基本就是一块空白，这致使整个国际共运各国在取得政权后的道路却走得艰辛和曲折。这归根结底都无不是欲用脑中的理想、胸中的热情和手中的权柄，试图去跨越、绕过、省略整整一个时代的资本主义文明，抹煞其历史必然性，从而致使那在西方思想史上从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却又在东方革命中走过了一条从科学倒退回空想的历史大弯路。

###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苏版马列主义；东方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从科学倒退回空想之历史大弯路；中国模式；

### 本文音频版

## 引 言

今年 5 月 5 日，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日。世界上很少有一位思想家，获得过后世持续一个半世纪近乎于神的景仰或近乎于魔的诅咒。然而，马克思既不是神也不是魔，故凡是将马克思视若神灵或恶魔者，其荒谬就不在马克思而在解读者自己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突破苏版马列主义<sup>1</sup>的结果；中国的现实困局，又是囿于苏版马列主义的结果。同理，中国共产党拿下全国政权，是突破苏版马列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所走过的弯路，也是囿

---

<sup>1</sup> 马+列=斯，苏版马列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

于苏版马列主义的结果。

不知从何时起，“中国模式”、“中国话语权”逐渐成了世界热词。然而，无论是鼓吹者还是批评者，都统统忽略了：中国模式是东方马克思主义模式，中国话语权是东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马克思主义已无远弗届，传遍世界各个角落，主导或引起了世界政治格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既是这翻天覆地变化的产物，又加深了这变化的翻天覆地的效应。然而，以苏俄“十月革命”为界，世界马克思主义营垒却发生了大分化，分裂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党国际和“马列主义”的共产国际。自此，社会主义在十九世纪的西方思想史上，完成了它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后，却又在二十世纪的东方革命中，不期然地走上了一条从科学倒退回空想的历史大弯路。

自从“苏东模式”轰然坍塌，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就都将目光转向了中国，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从昨天的中国共产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也将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正像当代中国的任何重大事变，均无不与中国共产党相连一样，中国今天的崛起和转型，中国未来的走向和兴衰，也同样无不与中国共产党未来的走向和兴衰息息相关。

面对“十月革命”以降，东方革命历经整整一个世纪、横跨大半个地球的历史大弯路，对它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总结，这一任务，已历史地落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双肩。西方马克思主义（“西马”）实无力承担起此项任务，故东方马克思主义（“东马”）将应运而生。如果中国共产党能挑起这副历史重担，成为东方革命的火车头和航标灯，那还愁什么“中国模式”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愁什么“中国话语权”不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呢？

## (一) 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历史贡献，就在于将人类数千年来延绵不绝的平等、自由、均富、公正、……这些素朴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升华为科学。

我们知道，无论在东方文化还是在西方文化中，对人间不平的批判，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均不绝于缕。武器的批判让一项项皇冠落地，批判的武器汇一条条源流荟萃。在西方，有从赫西奥德的《黄金时代》<sup>2</sup>到柏拉图的《理想国》<sup>3</sup>；从莫尔的《乌托邦》<sup>4</sup>到洛克的《政府论》<sup>5</sup>；从爱尔维修的《论精神》<sup>6</sup>到温斯坦莱的《自由法典》<sup>7</sup>到摩莱里的《自然法典》<sup>8</sup>，再到巴贝夫<sup>9</sup>、圣西门<sup>10</sup>、傅立叶<sup>11</sup>、欧文<sup>12</sup>的追求，……。而在中国，则有从《诗经·硕鼠》<sup>13</sup>到《礼记·礼运》<sup>14</sup>；从张鲁的五斗米教<sup>15</sup>，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sup>16</sup>；从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sup>17</sup>到章太炎的《五无论》<sup>18</sup>、到康有为的《大同书》<sup>19</sup>，再到谭嗣同<sup>20</sup>、梁启超<sup>21</sup>、严复<sup>22</sup>、孙中山<sup>23</sup>的寻

<sup>2</sup> 赫西奥德 Hesiod (古希腊) 约公元前 8 世纪，享年不明，诗人：Golden Age.

<sup>3</sup> 柏拉图 Plato (古希腊) 公元前 427-347，哲学家：Republic.

<sup>4</sup> 莫尔 St. Thomas More (英) 1478 -1535，欧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The Utopia.

<sup>5</sup> 洛克 John Locke (英) 1632 -1704，哲学家：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sup>6</sup> 爱尔维修 Claude Adrien Helvetius (法) 1715 -1771，哲学家：On Mind.

<sup>7</sup> 温斯坦莱 Gerrard Winstanley (英) 1609-1652，思想家、政治家：The Law of Freedom in A Platform.

<sup>8</sup> 摩莱里 Etienne-Gabriel Morelly (法) 1700-1780，思想家：Code of Nature.

<sup>9</sup> 巴贝夫 Francois Noël Babeuf (法) 1760-1797，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因革命被处死刑。

<sup>10</sup> 圣西门 Comte de Saint-Simon (法) 1760-1825 年，思想家、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

<sup>11</sup> 傅立叶 Charles Fourier (法) 1772-1837，哲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sup>12</sup> 欧文 Robert Owen (英) 1771 -1858，实业家、慈善家、思想家、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

<sup>13</sup> 《硕鼠》是一首古今公认的控诉剥削者的诗歌，原载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集《诗经》。

<sup>14</sup> 《礼记·礼运》中大同篇，即“大道之行”一段，以宣扬孔子的大同小康思想而脍炙人口。

<sup>15</sup> 张鲁，(东汉末，?-216)，《三国志·张鲁传》：“县置米肉以给行旅”“行路者量腹取足”。

<sup>16</sup> 陶渊明 (352-427)，东晋末诗人、辞赋家。《桃花源记》描写了与世隔绝的自由平等生活。

<sup>17</sup> 洪秀全 (1814-1864) 太平天国领袖，《天朝田亩制》为其建国纲领，体现绝对平均主义。

<sup>18</sup> 章太炎 (1869-1936) 清末思想家。《五无论》为：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

<sup>19</sup> 康有为 (1858-1927)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大同书》体现了其维新改良派大同理想。

<sup>20</sup> 谭嗣同 (1865-1898)，清末民初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六君子之一，赴难时年仅 33 岁。

<sup>21</sup> 梁启超 (1873 年-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sup>22</sup> 严复 (1854-1921)，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

<sup>23</sup> 孙中山 (1866-1925) 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缔造者，倡三民主义。

觅，……。所有这一切人类文明长河中永远闪烁着理想光辉的思想结晶，尽管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但均无不蕴含有一大共同特征，即认为要实现人世间的平等、自由、均富和公正，要达到那自人类产生以来便殷殷以求的大同世界，就都是可以通过对正义原则的发掘和探索，通过对理想模式的论证和设计来实现的。

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不是别的学说，唯有马克思主义，才破天荒地提出了与所有前人均截然不同的人类社会解析模式，一种全新的有关人类发生、发展、演化和变迁的世界观。这个全新的世界观在十九世纪中叶一经问世，便立即作为一个标志，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思想史上所有汗牛充栋的其它各色学说区别开来，且迄今亦然。

正是这个崭新的世界观，终于将数千年来一以贯之地头足倒立的那种历史观，即用思想观念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之终极本源的历史观，第一次还原为将物质生产视为人类发生、发展之终极本源的历史观。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简称历史唯物论或唯物史观。

从一般意义上说，既然“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统一的科学。”<sup>24</sup>；从特殊意义上说，既然世间万事万物千姿百态、互相区分的内在根据，正在于各事物自身的质的规定性，那么，是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否修正、违反、背叛或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不就应当如同自然科学一般，以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为其评判准绳，并在此公设前提下以实践结果为据吗？

历史唯物论之于马克思主义，就如同牛顿定律之于经典力学，进化论之于达尔文主义，相对论之于爱因斯坦学说，证伪说之于波普尔科学哲学，……等等一般，均构成了特定理论与其它理论相区别开来

---

<sup>24</sup> 马克思：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下同），第42卷，第128页。

的质的规定性。离开历史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是其他任何理论，却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础和全部理论活水的源头。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谈到马克思一生中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列宁则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谈到马克思主义所继承的当时欧洲先进文明的三大源流：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并将其改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但是，无论从恩格斯的论述还是列宁的论述中，均一丝一毫也看不出有着后来在苏版马列主义教科书中，所传达出的那种用并列关系来阐释马克思两大发现或三个组成部分这样的意思。

恩格斯是这样说的：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sup>25</sup>

而列宁则是这样说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他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

<sup>25</sup>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4年第2版，下同），第3卷 第776页。



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sup>26</sup>

在这里,恩格斯强调了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说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与资本主义社会特殊规律的关系;而列宁则强调了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引入唯物论,而创造出来的唯物史观哲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的基础性地位。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历史唯物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历史唯物论在政治学中的应用。而作为应用科学,它们的任何论断和结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以特定的时间、空间为转移的,都是随着人类实践-认识的广狭深浅,而可以、也应当不断被发展和修正,从而都是不得以任何教条的方式去对待的。

而唯有特定科学的质的规定性,却与该科学本身同在。

我们知道,在任何门类的学科中,都有其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分。而在应用科学中,还可以分出诸如设计学、工程学、工艺学,……等等操作门类来。同时我们还知道,修改工艺不等于否定工程;修改工程不等于否定设计。而在设计上出了错误,也并不能直接就等同于设计学本身出了问题,更何况,即使设计学乃至整个应用科学都出了毛病,那也未必就能推翻其赖以生存的基础科学。所以,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就不在于他的应用科学部分,而在于它的基础科学部分。所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其他任何理论,相对于历史唯物论,便统属次级理论。

---

<sup>26</sup>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1992年第3版,下同),第2卷第310-311

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历史唯物论在其经济学中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历史唯物论在其政治学中的应用。可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剥削理论，还是其政治学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均统统不过是建立于历史唯物论基础之上的派生性理论而已。毫无疑问，这些理论，当其建于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当其用唯物史观来阐发时，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而若一旦脱离开历史唯物论这个基础，一旦抛开那作为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之既定公设的唯物史观，那么，它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便会骤然模糊起来，甚至与马克思主义无缘了。换言之且质言之，凡是脱离开唯物史观这个理论基础和理论源头的任何马克思主义的次级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术语、乃至词藻，均统统可以被异化为某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术语、乃至词藻了。这里，哪怕是一些看上去最具无产阶级“阶级性”的理论范畴，包括诸如“剩余价值”、“公有制”、“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等等，均概莫能外。

譬如，左派们成天抓住“公有制”对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穷追猛打，改革派也总是在这个“公有制”问题上显得理屈词穷，高悬免战牌。故在中国左派们眼中，这“公有制”便是最具社会主义的标志性意义了。不过试问：任何不是建立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特定历史自然发展阶段上的公有制，有丝毫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公有制吗？中国历史上几千年前就有过“公而忘私”<sup>27</sup>之说。难道那时候的“公”或“公天下”<sup>28</sup>，以及其中所蕴含着的“公私观”，与今天马克思主义词典中的“公”与“公有制”，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公私观”，是一码子事吗？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眼光来看，

<sup>27</sup> 班固（东汉）：《汉书·贾谊传》“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

<sup>28</sup>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宋史·孝宗纪》：“高宗以公天下之心”。



各阶级都有着自己的“公”与“私”，各阶级都有着自己的“公私观”，因而各阶级也就都可以有着自己的“公有制”或“国有制”了。远到中国历史上的盐铁官营，近到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国企”，难道你能称它们为“社会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吗？

由此可见，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也唯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灵魂和生命，才是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质的规定性。

所以，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就不在于他的应用科学部分，而在于它的基础科学部分。既然唯有历史唯物论，才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其它形形色色的学说区分开来。仅此即可见，任何只敢在马克思主义的次级、派生理论上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各路英雄豪杰，只要你不面对历史唯物论，你就休谈驳倒马克思。这就如同任何人不敢面对 $E=mc^2$ ，就休谈驳倒爱因斯坦一样。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曾试图挑战唯物史观的人也大有人在，譬如那位“速朽明星”波普尔。<sup>29</sup>

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任何哲学一样，是从人类的终极关怀上，全景式地俯瞰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探索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解析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却不能不紧紧地贴近实际生活，不能不随时受到实践的严峻挑战及苛刻检验，从而不能不是一种可随时修正的、适应性很强的、将理想融入现实而不断发展的理论。

事实上，一个半世纪以来，欧美、大洋洲，尤其是北欧社会主义的胜利，它所结出的丰硕成果，即那种已举世公认地引领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一步一步地向着工人阶级妥协、向着劳动解放迈进，从而一步一步地缩小着国家与社会、官和民之间距离，将整个资本主

---

<sup>29</sup> 参见：刘擎：《卓越而速朽的思想家——纪念卡尔·波普尔逝世10周年》，见《爱思想》刘擎专栏。

义文明的前锋已提高到了一个崭新历史高度、一个几可成熟到向社会主义迈进的阶段，就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者干资本主义又引领资本主义，并向着社会主义方向演进之政治实践的胜利。

所以，将社会民主党人排除在马克思主义营垒之外，斥之为“修正主义”，视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敌人，这是马克思主义传入落后的东方国家后被宗教化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人至今仍还在吃这个被俄国人宗教化了的、应当打上引号的“马克思主义”的亏。

在国际共运内部，今天，朝共正指责中共是“修正主义”；昨天，中共也曾指责过苏共是“修正主义”；前天，苏共同样指责过南共是“修正主义”。当然还有更早，列宁当年曾指责整个第二国际即今天的社会党阵营是“修正主义”。

但是，无论是当年考茨基指责伯恩斯坦，还是后来列宁指责考茨基；无论是当年铁托指责吉拉斯，还是后来斯大林指责铁托；无论是当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还是后来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无论是当年邓小平批毛泽东（“四人帮”），还是后来金日成批邓小平，……等等、等等，回顾国际共运中这一个个多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回顾世界近、现代史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关联的一系列实践变化与理论变化，那么，究竟何谓“结合”，何谓“发展”，何谓“修正”，何谓“教条”，又何谓“背叛”呢？

面对这一切的一切，今天，作为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难道我们不统统应当用历史唯物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质的规定性这同一把尺子、同一个公设，并以其在革命实践中所获得的检验结果，来重新一一地加以衡量吗？

历史唯物论认为：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sup>30</sup>

历史唯物论还认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31</sup>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产物。<sup>32</sup>

历史唯物论指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

---

<sup>30</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285页。

<sup>31</sup>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584页。

<sup>32</sup>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1页。

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sup>33</sup>

历史唯物论还指出：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sup>34</sup>

历史唯物论批判道：

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sup>35</sup>

历史唯物论还批判道：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

<sup>33</sup>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31-32页。

<sup>34</sup>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4-755页。

<sup>35</sup> 同上，第732页。

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sup>36</sup>

## （二）历史唯物论经受住了正反两方面实践的考验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经受住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考验。

在世界的西方，人们往往不得不面对如此困惑的情景：在那里，哪怕是上台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毫不掩饰其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政府，但它最终却不得不承袭或采取各式各样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策，哪怕这些政策看上去简直就像是直接抄袭自《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或其他马克思主义文献。譬如：征收高额累进税<sup>37</sup>、高额遗产税<sup>38</sup>；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sup>39</sup>；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sup>40</sup>；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sup>41</sup>；对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sup>42</sup>，取消童工劳动<sup>43</sup>；……，等等、等等。马克思、恩格斯一个半世纪前的这些理想，这些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之阶级性的理想，这些为共产党人制定的管理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却在当今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逐步变为现实。从欧洲到北美，从东亚到澳洲，这些已经让人们见惯不惊的日常生活，均有力地证实了唯物史观早就揭示过的历史大趋势：社会化的

---

<sup>36</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8-230页。

<sup>37</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

<sup>38</sup>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

<sup>39</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sup>40</sup> 同上

<sup>41</sup>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0页。

<sup>42</sup> 同上。

<sup>4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生产力必将社会化地改变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社会化改造。由此可见，正是当代资本主义，正是资本主义文明所内在地蕴含着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内在矛盾所展示出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才使得资本主义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使之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社会主义。

然而，在世界的东方，则完全是另外一番图景：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和缩小阶级差别相反，在东方后发国家里，却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sup>44</sup>自从列宁当年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如汪洋大海般地存在着的小生产经济基础时起，历经一个世纪，整个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都最终没能靠国家强制力而阻挡住各自国家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在中国，毛泽东艰苦奋斗了三十年也割不掉那野火烧不尽的“资本主义尾巴”；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们使出浑身解数至今也仍反不掉那前仆后继且愈演愈烈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类似情形，中国如此，苏联如此，东欧如此，朝、越、古亦如此。

可见，与历史必然性作战，就如同唐·吉珂德与风车作战。如果说，斯大林当年一批又一批地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都仍旧阻挡不住苏联的“变修”；如果说，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全面阶级斗争都仍旧阻挡不住中国的“走资”；如果说，中国历经三十年反腐却是贪官越反越多、层级越反越高、数额越反越大；如果说，朝鲜共产党政权今天坚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结果竟然是公然以世袭王朝示人，……，那么，当年列宁与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大论战；也即最

<sup>44</sup>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选集》第4卷 第135页。



终导致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分道扬镳的那场世纪大论战——

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sup>45</sup>

——今天总该得出结论来了吧！

这个结论便是：在任何后发国家，无论何人，无论以何种动机，无论打什么旗号，将反帝与反资混为一谈，大反资本主义——市场+宪政+多元——文明的结果，就只能导致本国那有着根深蒂固传统的封建<sup>46</sup>宗法专制皇权文明，在潜移默化中的死灰复燃，乃至复辟。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其实，正是这种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且无论多么严酷的国家暴力也压制不住的东西，才是历史发展途程中最具顽强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才往往反映历史大趋势，体现历史必然性。偏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历史必然性为敌，共产党就难免由当年与人民“鱼水情”的生气勃勃的真老虎，变为如今与人民“油水情”的风声鹤唳的纸老虎了；就难免左冲右突都走不出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sup>47</sup>的可怕历史周期律怪圈了。

因此，凡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就一定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只能是晚期封建宗法专制文明社会了。因为，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

---

<sup>45</sup> 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载《列宁选集》第4卷 第778页。

<sup>46</sup> 本文所提“封建”均系约定俗成意义，即指前资本主义时期而非学术上专指“分封”意义之“封建”。

<sup>47</sup> 原载《左传·庄公十一年》，此言为黄炎培与毛泽东那著名《窑洞对》（1945年7月）引子。

义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比资本主义更新、更高的生产关系，它的物质生存条件，就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胎胞里才会孕育成熟。由此可见，基于历史唯物论，基于历史必然性，我们便可作如下一般性的概括了：

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共产主义因素的社会 = 已成熟到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末期社会主义社会；

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 = 已成熟到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末期资本主义社会；

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 = 已成熟到可以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末期封建宗法专制社会。

如此看来，中国今天还处于怎样的一个历史阶段？该进行怎样一种性质的革命或改良？当是不言自明。

自近代航海术将全球各部分人类文明连成一片、从而人类开始真正的世界史以来，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便与人类各文明在它原本那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下所达致的历史发展阶段遭遇和碰撞了。如此，便发生了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地球的不同文明区域同时并存的现像。从横向上看，在时间轴上它们是同时的；从纵向上看，在文明史上它们又是不同时的。

什么叫“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这就是典型的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当西方文明已经开始步入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期时，而中国社会才开始渐入后封建宗法专制皇权文明社会向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转型期。这个文明现代化的转型期，自 1848 年中国传统文明被西方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时起，历经一个半世纪，几经艰难曲折，至今尚未最终完成。

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革命已相继

完成、资本主义制度已相继建成时，而东方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关系却还处于萌芽状态，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社会形态。当西方资产阶级干革命时，马克思主义尚未诞生，故那时指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自然就还只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了。而当东方的资产阶级开始干革命时，从西方除了可引进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外，还可以引进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还可以引进马克思主义。

然而，当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和伦敦讨论无产阶级革命时，那么这同一个马克思主义在这同一个时间，它在莫斯科和北京就只能讨论资产阶级革命，讨论前一个人类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列宁和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能分别地在俄国和中国革命中脱颖而出，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打天下时，能力排众议，牢牢地把握住本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大方向。同理，列宁、毛泽东后来的“跌得粉碎”<sup>48</sup>，也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夺取政权后，又都偏离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大方向。

中国共产党常说：新中国建立之初，它所接手的简直就是一个烂摊子；旧中国留下的只有一穷二白。事实也的确如此。在 1949 年，中国几乎完全没有自己的基础工业，全国钢产量仅 16 万吨，原油产量仅 12 万吨。那时的中国，工业产值只有 10%；工商民营企业则不过区区 16 万个，这还是以资本 2,000 元，工业雇工三人，商业雇工二人为基准这种手工工场标准来核计的。中国那时的城镇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 10.6%，其余则全都是农民。至于农业，更是 100% 的人畜动力型自然经济。并且，全国成人文盲率为 80%。<sup>49</sup>

可是，中国共产党却要在这样的物质生存条件、这样的一穷二白生产力基础上，运用其脑中的理念和手中的权柄，来描画“最新最美”

---

<sup>48</sup>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66 年 7 月 8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1 页

<sup>49</sup> 以上数据，均来自 [《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见《北京之春》1996 年 2 月号。](#)

的“社会主义”图画了<sup>50</sup>。当年，西方的圣西门、欧文、傅立叶没有做成功的事，今天东方的毛泽东挟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胜者雄风，要在中国重新实验了。

然而，历史唯物论在问、科学社会主义在问：中国共产党当年打得天下、进入北京的时候，中国的物质生存条件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当时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是在呼唤着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呢？在 1949 年的中国，它的市场化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便业已构成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了吗？以现代化大生产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便业已发展到必须冲破其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壳了吗？一句话，在当时中国大地上尚属新生事物的资本主义文明，便业已成熟到可以向更高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过渡了吗？

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不知道中国的物质生产力条件有多落后么？不，太知道了！正因为太知道，其欲改变这落后面貌的愿望才会太强烈、太迫切了。这仅从当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班人，其笔记本上常常记有中国与美日英法德历年来的钢产量数据对照表来看，即可窥见一斑。

然而，毛泽东刚一坐进中南海，就开始嫌他当年在马背上承诺的“约法三章”太碍手碍脚了。请看，作为开国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签署的墨迹未干，中国共产党就将其原本属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执政、其性质当属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框架下的联合政府，以一个“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sup>51</sup>来擅自“释宪”了。

如此一来，当年那被“耕者有其田”这个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口号所激励，向共产党奉献出数百万血肉之躯的 5 亿农民，那几乎

<sup>50</sup>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77-182 页。

<sup>51</sup> 见杜光：[《人民民主专政——简论意识形态领域的若干理论问题之五》](#)，见 Nova 的博客。

是用小车推出一个新中国的 5 亿农民，其刚刚才到手的土地还没有给捧热，就又被合作化给“共产”了。而那些当年在内战中积极参与护厂、护矿，相信共产党“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庄严承诺，而拒绝撤迁去港澳台的民族资本家，才刚刚将从战火中保存下来的工厂、矿山重新运转起来，其马上又被“公私合营”了。与此同时，当年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反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所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则统统开始了“花瓶”化的历程。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与中共党内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党内路线斗争，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关系的逐步“君臣”化同步的。

从那以后，党内外的一切不同声音，哪怕是政策性分歧，就都统统给贴上一枚“资产阶级”的标签，被视之为“邪恶”和“反动”了。在毛泽东时代，它们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在邓小平时代，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敌对势力”，……。

自“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东方落后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革命最终都走向了当年共产党人干革命那拳拳初心的反面，走进了这样一个死胡同：在执掌政权的原革命阶级内部，均无可避免地产生出了一个新生的官僚特权腐败阶层。在苏联如此，在东欧如此，在中国如此，在朝鲜亦如此。如今，在朝鲜这种号称共产党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公然面对全世界，明目张胆地和恬不知耻地搞起了共产党总书记金日成的血统世袭制。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将阶级划分，简单地搞成“划（血统）成分”；将严肃的阶级斗争搞成庸俗的“血统论”，也是早有其传统的。今天中国官场那种“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靠得住”的潜规则，那种直系血亲与旁系姻亲在各级政权系统中的泛滥，那种肆无忌惮的“拼爹”、“拼爷”所表

现出来的小农宗法意识的丑陋与落后，以及它对巴黎公社精神的彻底背叛，与朝鲜相较，只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而已。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尽管物质文明这一块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精神文明这一块上，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说是一败涂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全民无基本共识、国家无核心价值，……。而所有这一切，其源盖出于中共改革派至今还拿不出高屋建瓴、力压群雄、令人折服、深具前瞻力的核心价值理论。

胡锦涛曾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不改旗易帜”。可真命题却是：你本身究竟举的什么旗？面对这个被左派们一再敲打、一再追问着的真命题，整个中国共产党都在作鸵鸟状。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史已在在证明，如此事关国家发展方向的核心价值不解决，整个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就没有了精气神和凝聚力。

今天，最让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困惑的，是共产主义理想和资本主义现实的纠结：有干脆抛弃共产主义信念，认为过去几十年入党干革命是一场噩梦的；也有将现实一言以蔽之为“资本主义复辟”，要以“反修”、“反复辟”为大业的；当然，还有以各种过眼云烟般地新词汇、新提法，乃至重拾儒表法里之国粹，来含糊其辞、来粉饰现状、来盲目自信的。

诚然，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来创造历史。他们既继承了毛、邓两个时代所创下的巨额正资产，同时也不得不承负着两个时代所累积下来的沉重负资产。在他们今天正承接下的这份家业，正在吃的这份老本中，是既含有正能量也含有负能量。邓小平路线，从而今天的中国，固然摈弃了毛泽东时代诸多空想社会主义的左倾错误，在经济上向资本主义文明敞开了一条口子，由此也带来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明显的改观和进步。但同时，它不



仅承袭、并还大大强化、甚至恶性膨胀了当年毛泽东一直想革除、却又总是革除不了的官僚特权弊端，从而使得如今中国官场的腐败和黑暗，简直到了登峰造极和触目惊心的地步。所以在今天，凡真正对苏共、中共的演变而痛心疾首的列宁和毛泽东的学生，凡愿正视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愿意痛定思痛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必须明白这个失败的根本原因：必须毫不犹豫地重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未结束，还必须继续高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基于此，才谈得上具体探索共产党怎样顺应和驾驭那不可跨越的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

目前，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大的理论与实践难题，最终都落脚到一个吏治上，即那已威胁到共产党政权生死存亡的体制性干部腐败。面对吏治腐败的攻城略地，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经吃过前三十年左倾路线的苦头，也开始尝够后三十年右倾路线的苦头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腐败当然更不是社会主义。大面积、病入膏肓的干部腐败之严酷现实，已经并正在动摇党本国本。极而言之，从一定意义上，这甚至可以说是当年的“红区损失 90%，白区损失 100%”在新时期的重演。

所以，中国当今矛盾之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均聚焦到了一点：如何更新和重续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的执政合法性，是靠前仆后继的流血牺牲，是靠硝烟弥漫的战场拼杀打出来的。而它的红二代继任者，若仅靠“打江山、坐江山”这个千年古训，仅靠吃“历史不可逆”<sup>52</sup>这个成年老本，那么，这个“合法性”就只会流失，事实上它今天已几乎流失到了危机示警的地步。所以，今天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尖锐问题，首当其冲，就与其说是意识形态

---

<sup>52</sup> 参见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李零，思国运》。

的价值符号问题，倒不如干脆说是究竟怎样才能保住共产党政权的问题。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内，谁能直面这个越来越紧迫的重塑合法性难题，并知难而上，领先破题，谁就能登高一呼，引领群伦，掌握未来。谁能从制度上拿出治国安邦良策，拿出能凝聚全民族的核心价值，谁就是代表了新时期的正确路线；谁能从根本上保证共产党政权的长治久安，谁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了毛邓，又超越了毛邓。

### （三）苏版马列主义，既不姓马，也不姓列，而是姓斯

不错，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警惕于自己的政权被取而代之，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和被“资本主义复辟”。然而，它却万万没有料到，当自己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里顽固地拒绝资本主义文明，顽固地抗拒历史必然性时，它就已开始偏离当年打天下时的那条曾引导自己从小到大、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了；它就已开始将一个原本有希望领导中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蜕变为一个被所夺取到的国家政权这个“祸害”<sup>53</sup>所腐蚀的农民造反党了。

中共党内改革派，即使如最前卫的领袖胡耀邦和赵紫阳，当然还有邓小平，都从未表现出要从正视中国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唯物论的高度，来阐发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老是囿于从苏版马列主义教科书中所获得的那种“社会主义”价值禁忌，总是企图将全部改革理论大厦建立在最大限度地减低“社会主义”的纯度上，所以才有“初级阶段”等诸如此类的提法。

---

<sup>53</sup> 参见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

然而，将“社会主义”视为无条件、超时空的“善”；而将“资本主义”视为无条件、超时空的“恶”，此类价值观或世界观，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唯心论，不折不扣地与历史唯物论南辕北辙。所以，正本清源，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实事求是地建立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之经济基础上，这才是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业已四十年后的今天，要将人们的思想从统治中国思想界大半个世纪，且至今还积重难返的苏版马列教科书那唯心史观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现在回过头去看当年毛泽东与刘少奇那场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分歧，应该说，争论的双方，其分歧点也仅仅是在激进或缓进的策略上。他们那时谁也没有意识到：抛弃资本主义的权利平等文明，不仅不会将国家引向事实平等文明的方向，反而会导致低于资本主义文明整整一个时代的封建宗法专制特权文明的复辟，反而会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背道而驰。不过这也难怪，实践的广狭深浅，制约着理论的广狭深浅：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从“十月革命”至今，均仍处于试错和探索之中。

不能不承认，列宁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钻研得相当深入、理解得相当透彻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但是，在现成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武库中，却并无落后的东方如何革命、尤其是如何进行其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大块。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列宁当时身兼新社会的理论创新人、战略家、设计师和工程师这多重角色。因此，列宁不仅一般地也如任何伟人一样不可能超出其时代的局限，而且还特殊地受困于“第一个”探路人的局限。不过，列宁早年在与俄国民粹派的论战中，便毫不含糊地提出：

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演进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sup>54</sup>

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坚决屏弃了他们的这种荒诞言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sup>55</sup>

仅此即可知，早年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就已相当深厚。然而，作为理论家的列宁和作为革命家的列宁却并不能直接等同，尤其在历史大动荡、大转折时期更是如此。列宁在晚年不仅一退再退到“新经济政策”，而且在最后病重期间已经意识到苏维埃政权官僚化的现实危险。于是他口授了后来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怎样组织工农检察院》，文中特别强调，必须直接从工人和农民中挑选中央监察委员。可惜列宁英年早逝，年仅 54 岁。或许整个国际共运，至今都在吃着列宁英年早逝的亏。

固然，马恩也曾论述过落后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如何对待现实中的资产阶级革命，但他们当时所说的最“落后”的国家，也是指的德国：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sup>56</sup>

是列宁，第一个填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并无东方落后国家革

<sup>54</sup>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载《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32 页。

<sup>55</sup>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载《列宁选集》第 1 卷 第 556 页。

<sup>56</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06 页

命这一大块空白，并将马恩关于落后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参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发展成了一套“共产党人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并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关系鼓与呼。

是列宁的“共产党人干（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为东方落后国家的新型资产阶级革命，打出了一大片天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就是在列宁这个理论指引下成功的。毛泽东的整个打天下理论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也正是在列宁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为至今仍让中国共产党人引为骄傲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证明，在夺取政权问题上，列宁、毛泽东的理论无疑是成功的，他们都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夺得政权，按照毛泽东的话来说便是：上下两篇文章，还只完成了上篇。<sup>57</sup>因此，东方国家共产党人领导的这个新型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下一步的路究竟该怎么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没有任何具体的答案，既没有实践的答案，也没有理论的答案。有的仅仅是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指引。而在列宁那里，有的则是夺权前的朦胧展望和夺权后的试错尝试。

在 1905 年，列宁在论及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必须领导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就曾展望道：“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sup>58</sup>

但到了十月革命四周年时，列宁却公开承认错误道：

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sup>59</sup>

然而，列宁过早地逝世在了由他发起和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改

---

<sup>57</sup> 参见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下同）第 276 页。

<sup>58</sup>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载《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633 页。

<sup>59</sup> 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载《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570 页。

革开放”（新经济政策）任上，这使得苏共完全没有留下任何有关共产党人领导和驾驭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必然性的理论。而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共从老大哥那里照抄照转的马列主义，其实既不姓马，也不信列，而是姓斯。

其实，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都看到了当年由自己所一手参与建构的那个苏联模式的弊端。

毛泽东看到了强大的官僚机器和人民之间的对立，他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想绕开或跨越资本主义文明，用国家强制力来取消资本主义这个自然发展的历史阶段，从“斗私批修”中去获取人们自我牺牲的精神动力，以加速这个问题的解决。然而，他至死都压根儿没有意识到，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比他所发现的那个问题还要大、还要严重的问题。

毛的整个思路，从他赞赏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到他号召“斗私批修”的“五七指示”，从他的鄙弃军衔制、工资等级制，赞美供给制、赞美“做革命螺丝钉”，赞美利他主义，提倡学大寨、学大庆中的“忘我”、“牺牲”、“奉献”，……等等、等等来看，其中均无一不与贯穿中国数千年从张鲁“五斗米教”到康有为“大同书”中的思想，一脉相承。

然而，中西文明中均存有过的这种人类延绵了数千年的大同理想，之所以一直无法实现，归根结底不应归因于人们的自私和自利，不应归因于社会的世风与道德；而应归因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条件使然，归因于社会的物质生存状况使然。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发展程度，制约着人类的精神文明发展程度，而不是相反。人类任何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这个历史铁律面前，均绝无阻挡之力。相反，任何挑战历史规律的豪迈与任何挑战自然规律的狂妄一样，是没有不受到历史无情惩罚的。



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那许多让如今的中国左派们均不敢正视或不愿正视的荒唐人间惨剧，几乎无一不是用国家强制力去推行“社会主义”良好愿望的恶果。其实，中国大地上如今让世人震惊的全民“利己主义”大爆炸，难道不正是当年那并无物质文明支撑的“利他主义”，在跌得粉碎后的恶性反弹么？

尽管邓小平（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或主动或被动地也参与了毛时代的几乎所有左倾错误，但他（们）毕竟是处于这个庞大国家机器的前台操作者。而现实运作的惯性，又都无一不受着铁的经济法则的支配：不讲投入产出效益的大呼隆经济运作，必然要受到经济规律的严惩——饿殍遍野、全国饥馑。没有充足的物质基础，哪怕仅仅维系国家机器的最起码日常运转，又都不能不给干部们以某种特殊待遇，并还只能按等级配给，从而也就不可能消除特权的基础。而这些维持着最起码社会日常惯性运作的背后，又都不可抗拒地将其现实政策的可操作性，向着利益导向的资本主义文明倾斜：如“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级工资”、“物质刺激”、“干部特殊化”、……等等、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从延安高度匮乏时期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传统，以及从苏联模式中引进的从物质产品到精神产品的特供制度，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又都使得这一架不是靠市场那看不见的手，而是靠层层命令运作的庞大机器，即使仅靠其自我惯性，就都无不朝向强化秩序、强化效率、也强化特权、强化奴役……的方向去运转，直到走向崩溃的边缘，才被迫调整，如1962年“七千人大会”，如1976年“粉碎四人帮”，……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当年的改革开放，几乎是在没有理论指导下而仓促地起步的。邓小平那一句“摸着石头过河”，倒也形象地道出了这种窘境。这是因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中，几

可说是完全找不到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人，在夺得政权以后当循怎样的路径去建设新制度的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其所阐发的任何有关未来新社会的论述，均无一不是说的资本主义充分发达国度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如果说邓小平当年要用某种实用主义的方式去解释“社会主义”，那也自有他难言的苦衷。因为他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那里，均找不到任何可用的理论武器。有的，统统都是不准他干改革开放，不准他理直气壮地带领共产党作战略大撤退干资本主义的。所以，他只好“不争论”。

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sup>60</sup>。可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是何等的艰辛和何等的不易，且迄今亦然。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至少，经过前三十年的折腾，让邓小平看到了市场经济历史阶段的不可跨越、不可绕过和不可省略；看到了“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sup>61</sup>；看到了落后国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sup>62</sup>。

现在总还有人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认为不搞权力制衡，没有舆论监督也可以反腐，也可以把权力关进笼子。其实，要说用“整党”来反腐，有谁搞得过毛泽东？毛当时可是真心实意地反。建国之初，他就提出要砍干部子弟校；“三年困难时期”，连李敏、李纳也只准吃学校食堂；晚年更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的后半生，就是一心一意地反资本主义，一心一意搞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这也就是他临终时总结平生那“一生干了两件事”<sup>63</sup>中的后一件事。他搞了无数次运动，无数次整风，也整了不少人。到了晚年，他终于承认：

<sup>60</sup> 列宁《怎么办》，载《列宁选集》第1卷，第311页。

<sup>61</sup>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载《邓小平文选》（1993年10月版）第3卷，第137页。

<sup>62</sup> 邓小平《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载《邓小平文选》（1993年10月版，下同）第3卷，第290页。

<sup>63</sup> 毛泽东1976年6月15日谈话，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sup>64</sup>

于是，他才下决心搞了那场疾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把当年毛泽东时代的“黑暗面”与今天邓小平时代的“黑暗面”，放在一起比较一下，人们一定会惊呼：毛时代那些东西还称得上是“黑暗”吗？譬如：当年的“脱离群众”与今天的“你们屁民”；当年的“多吃多占”与今天无所不包的“官员特供”，再加“公款嫖娼”和“公款赌博”；当年的“走后门”与今天的“拼爹、拼爷”；……等等、等等。是的，正是当年那些个导致刮了一场文革暴风骤雨的如毛泽东口中的“我们的黑暗面”，若放到今天，人们简直会瞠目结舌它们是何等的“小儿科”，何等的小巫见大巫了。

可见，如果说，连毛泽东那样的强势、连文革那样的风暴，都把权力关不进笼子，如果说，从邓小平时期“高薪养廉”，到江泽民时期的“三讲”，再到胡锦涛时期的“保先”，……，等等、等等，都一个个最终化为了泡影，那么，离开了法制化的权力制衡权力，离开了法制化的舆论监督，你还真就有任何其他灵丹妙药，能将权力关进笼子吗？

须知当年的巴黎公社，即使是在炮火连天、短兵相接的战争非常时期，巴黎人也还是自发地在实行着多元派别共存和民选官员这样的政治文明。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权利平等的资产阶级文明，已早就成了巴黎人如同空气、阳光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成了他们的思维定式和文化惯性，也成了巴黎工人阶级可以从资产阶级——当时正与之血战的阶级敌人——文明中，可立即拿过来就用的现成成的文明遗产，尽管这个遗产的硬件即现存的国家机器应当被立即打碎。与此同

---

<sup>64</sup> 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1967年2月3日 参见金冲及：“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儿？

时，巴黎工人阶级，也正是在继承了资产阶级“权利平等”文明的基础上，还将自己对“平等”的追求和向往，向着“事实平等”这个更高历史阶段的无产阶级文明理想——普通工人工资制——大大地推进和提升了一步。

然而，当年中国共产党拿下政权时，构成中国人如同空气、阳光一般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和文化惯性是什么呢？这只要从毛泽东带领他的战友们去北京“赶考”时的参照系——李自成、洪秀全——即可窥见一斑了。如此也就难怪，诸如“打天下、坐天下”、“青天大老爷”、“父母官”、“任命制”、……这种种文明积淀，在国人心目中的天经地义了。再加上苏联老大哥送来的斯大林模式，以及冷战中不得不选边站的国际大气候，如此，便使得刚刚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不将那个曾经引导自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自家法宝新民主主义束之高阁，就在所难免了。

#### **(四) 谁来主导宪政转型，共产党或自由主义，二者必居其一**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论述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多半还属对未来理想的憧憬；如果说，列宁于 1907 年提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毛泽东于 1938 年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其着眼点均还在夺取政权上的话，那么，到了 1917 年 11 月和 1949 年 10 月，分别摆在俄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历史性课题，就骤然具有全新的意义了：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必然性，会因为共产党人胜利地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并执掌政权，而成为可以跨越、可以绕过或可以省略的吗？

自俄国“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国际共运史，均在地证明：靠着武装革命夺得政权的共产党，无论当时其革命雄风是何等的摧枯拉

朽，但对于那在本国还处于萌芽、成长、上升、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是绝无可能仅凭一纸法令，凭靠国家暴力，就能直接加以废除的。同理，一个崭新的、高于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政治制度，也是绝无可能在它的物质生存条件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孕育成熟之前，仅靠国家强制力就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若硬要用国家权力去挑战历史必然性，那是不可能不碰得头破血流，不可能不受到历史必然性惩罚的。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当年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人争论过，俄国社会民主党即后来的苏联共产党内争论过，此后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内也争论过。近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论与实践，它所走过的弯弯曲曲的试错道路，它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路线斗争，归根结底，均无不受这个争论的影响，并历经数代，绵延至今。事实上，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乃至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失败，和毛泽东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甚至还有斯大林模式和波尔布特模式的失败，以及今天邓小平模式的踟躅不前，……等等、等等，均无不与此争论有关。

是的，在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可以也应当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已没有争论了；硬要“毕其功于一役”，当属左倾机会主义，对此，党内也早有结论了。并且，在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初，还会有着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发展资本主义，对此也已没有争论了。如今真正的争议点则在于：是否承认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在夺取政权阶段要干（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在夺得政权以后还要干（领导）资产阶级共和国？

这里所讨论的，可不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毛泽东在文化大

革命中所提及的那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sup>65</sup>，而建设一个有着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型资产阶级共和国，一个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必然阶段，一个中国共产党既熟悉又陌生的新民主主义升级版。

这里所谈论的“东方后发国家”是这样一类国家：在那里，“权利平等”还是一种新生事物，还是一种理想和追求，还属一种尚待落实的国家宣示。在这样的国度里，各种各样的身份识别，血统的、地域的、官位的、……，像一张张网笼罩着每一个人，既包罗万象又层出不穷。人生而不平等，不仅是事实上的，还是条文上的，尤其是潜规则上的。这是特权文明的末期，衰亡着的特权文明与新诞生的权利文明同时并存，前者尽管猖獗但基本靠潜规则生存，后者尽管孱弱但已开始占据着明规则。

是的，正是因为站在列宁、毛泽东那悲壮失败的肩头，我辈今天才终于发现：一切后发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既要胸怀共产主义理想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以夺取政权，还要胸怀共产主义理想去领导整整一个时代的资本主义文明制度建设。只有后者成功了，前者的成功才能得到最终的巩固；只有后者成功了，才谈得上向下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摆在新一代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这个三百年前在英国，两百年前在法国，一百五十年前在美国，由资产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如今则要由具备彻底唯物史观的共产党人来承担了。无疑，这一课题，对于如今陷入改革困局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极具挑战性。因它在迄今为止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本本中，从未曾有过。

然而，在列宁之前，有过“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sup>65</sup> 参见《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256页；参见[《毛主席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第10条](#)。



吗？在毛泽东之前，有过“农村包围城市”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吗？更何况，如果说，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落后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还只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一场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这同一个历史发展不平衡性，难道就因为共产党人打赢了内战、夺得了政权就突然不翼而飞了吗？换言之，既然由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种区别于旧式民主革命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由共产党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否也可以是、应该是、或必须是一种区别于旧式资本主义的新式资本主义制度、区别于旧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式资产阶级共和国呢？

中国共产党当年在打天下时，毛泽东曾反复教育全党，中国革命不能跨越历史阶段，共产党现在所进行的革命，还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这种对历史必然性的清醒认识，顺乎了历史潮流，才使得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最终夺得了全国政权。同理，难道不也正因为毛泽东执政后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上陷入了某种盲目性，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陷入了某种空想，即欲跨越、绕过或省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才致使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走过一段很大的弯路，才致使即使已改革开放 40 年后的今天仍包袱沉重吗？

然而，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刻不容缓地把这个问题又重新提到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终于突破重重障碍曾产生过理论飞跃，而承认了市场经济为今日中国之必需的中国共产，今天还可能突破重重障碍再来一个理论飞跃，而承认民主宪政也为今日中国之必需吗？已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经济市场转型的中国共产党，还会成功地领导中国政治的民主宪政转型，以使中国经济的市场导向进入一个健康而平稳的轨道吗？

毋庸讳言，历史唯物主义这面大旗，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这面大旗，却只有共产党人才能高举，只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高举。自由主义者压根儿就不相信人类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压根儿就不相信“历史必然性”这一说。他们的全部理论基础就是唯心史观的抽象人性。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不屑一顾、也一窍不通。因此，中国共产党之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内转思想弯子和理论弯子，就自然不可能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了。这也是他们那一套自由主义宪政理论，根本就搔不到当今中国问题痒处的原因——这也包括了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派。至于作为自由主义旗帜的“普世价值”，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也确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之完全可以拿过来，用唯物史观加以改造，为我所用。总之，对于自由主义，对于普世价值的挑战，过去总是屡屡被动，根本原因在于自己手中的马克思主义不纯正，用的大都是苏俄牌赝品；加之死守完全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不愿正视现实中的阴暗面，故常常显得要么说不起硬话，要么强词夺理，反显底气之不足。

由此可见，对于当下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要么当仁不让，站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制高点，毅然决然地担当起中国民主宪政转型的历史重任，并将这个转型的主导权牢牢地操在自己手中，以建设一个新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即以自己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所引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么则拒绝宪政，抵制宪政，从而也就不期然地将中国宪政转型的领导权拱手让与自由主义，并在客观上用自己的手将自由主义推上历史和道义的双重制高点，使之主导着中国政治转型的话语权。如此也就完全和彻底地走向了自己初衷的反面，不仅守不住老一辈共产党人浴血奋战打下的这个家业，而且还让自由主义——其背后站着强大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所主导的这个中国政治转型，

来整个地清算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

这就如同当年，同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由大资产阶级去领导或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结果将迥然不同一样。今天，中国的民主宪政转型，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来主导，还是由中国自由主义来主导，其结局将会是迥异的。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今天在中国宣称“五不搞”，就正像当年宣称“为中共 100% 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一样，乍看上去，意识形态正统得很，政治也正确得很。但实际上，形“左”而实右，因为它的实际结果只能导致放弃共产党对政治转型的领导权，只能导致另类转型后的共产党人遭清算。可见，中国如今的民主宪政转型，由共产党来领导，还是由自由主义来领导，其步骤、方式、过程、范围、层次、趋势、结局、后果、……等等、等等，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格局，都将会是大不一样的。因此，今天中国的前途，要么是共产党领导的、且可自主创新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要么则是受国际大财团实际控制的、由中国自由主义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宪政。

二者必居其一。

有人说，搞宪政会将共产党搞下台。是的，岂止下台，还要清算，从 1921 年起开始清算！但那是“他们的宪政”而非“我们的宪政”，即按自由主义右派去搞的那一套宪政转型。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因抵制和拒绝宪政——将宪政的领导权拱手让与自由主义的恶果和必然结局。但若这个宪政由共产党自己来搞，实行拿来主义、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制度创新，那整个结局就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番图景了。这就如同当年听任国民党蒋介石搞三民主义，就决没有共产党的好果子吃；但后来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搞起我们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又叫新民主主义，其结果，就是将政权给搞到手了。

宪政，尽管它体现着资产阶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但它毕竟只是政体而非国体。一个国家由哪个或哪些阶级来统治，是哪一个或哪些阶级的专政，这统统都由国体来管。而宪政，则是指特定的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具体政权形式，即政体而已。诚然，宪政为近代资产阶级所创造，反映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但这些却并不构成否认宪政本身所具有的体制工具之意义。这就如战争中的武器，在敌人手中为敌人服务，缴获过来便可为我服务一样。正因为如此，巴黎公社才会在巷战正酣时就立即采用了它；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会说：“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sup>66</sup>。

我们知道，宪政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权力制衡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国家与法的理论，宪政的实质，不过是以特定的政体形式来巩固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而已，不过是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凝结为特定的国家政权形式而已。宪政，既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追求、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又是资产阶级防止封建专制特权侵蚀和复辟之最有力的制度保证。除此而外，在封建专制复辟的危险已基本消除后的整个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宪政更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摆平内部各派纷争，以防止统治阶级内部无序恶性权争，而导致政权崩解的治理系统。由此可知，既然他资产阶级可以将宪政玩得团团转，几百年来，既享受到权力制衡所带来的系统自调节、自更新、自止损、自修复的超级稳定，又让这宪政无论怎么玩，都玩不出他资产阶级的手板心，那么，共产党难道就不可以来个洋为中用，既充分享受权力制衡之根治腐败的超级红利，享受由此而带来的共产党政权的除旧布新和长治久安，又让这宪政的中国玩法，无论怎么玩，都玩不出共产党的手板心，并还能远离宗法专制特权复辟，并最终将国家导向未来

<sup>66</sup> 恩格斯：《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2页

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譬如，中共党内的毛、邓两条治国路线，本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但却因一直没有一种良性互动机制，而使其路线斗争从来都处于所谓“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的你死我活状态。大量的冤假错案均由此产生，并给共产党自身也带来极大的伤害，最终是两败俱伤，没有赢家，且至今亦然。但倘若借鉴并引入宪政中的制衡机制，让共产党内部实际存在、也不能不存在的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治国理念、治国路线，能有一种公开竞争、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平台和机制，并最终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择。这么一来，首当其冲，最起码那种由一派独大、毫无制衡而产生的权力腐败，会得到立竿见影的收敛，仅此即可从源头上扼住吏治腐败的咽喉。如此对共产党统治权毫发无损、反会因反腐成效的彰显而大得民心的宪政举措，为何就不可以实行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sup>67</sup>呢？

再如，宪政中的三权分立，其确有效率不彰的流弊，但却也有着遏止无限权力膨胀的功用。以中国人的智慧，难道就筛选不出一种两全其美、相得益彰的优化临界点，以此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式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宪政和新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制度创新？譬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公开竞争仅局限于共产党内部，从而无论党内哪一派执政又都让共产党并未失去政权。

还有，共产党最忌讳宪政的，无外乎是那多党制会把共产党搞下台。其实，越怕被搞下台，恐怕还真得下台。整个苏东剧变，就是共产党抵制宪政、拒绝宪政，结果致使宪政转型主导权落入自由主义右派之手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曾一再抱怨自由主义激进右派对他“公开化”改革的干扰。可他就是没有悟出：倘

---

<sup>67</sup> 鲁迅《拿来主义》 发表于 1934 年 6 月 4 日，载《鲁迅全集》第 6 卷“且介亭杂文”。

若由共产党来旗帜鲜明地领导和主导宪政，制度创新地将竞争仅局限于共产党自身内部，其结局恐怕就会完完全全是另外一码子事，苏联历史就将整个地改写了。

同样一个宪政，在美、英、法、德、日、俄、……均各有其特色。尤其于英、日，还有欧洲不少国家，宪政与帝制兼容，皇室与宪政各得其所。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宪政——尽管毛泽东在延安时曾有过“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设想<sup>68</sup>。中国共产党不是很强调“中国特色”吗？那何不干脆就自己搞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式宪政”来呢？在宪政问题上，什么叫“共产党的领导”？什么叫“拿来主义”？什么叫“为我所用”？什么叫“制度创新”？真可说是微妙法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里唯一需要的就是真懂马克思主义的悟性了。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还愁没有主动权？还愁会被搞下台？为何就非要采用当年那种“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来对待宪政不可呢？为何就非得要徒增社会对抗，并将“千军万马”和“浩浩荡荡”都驱赶到“西方敌对势力”那边去不可呢？！

不错，这乍一看来，还真仿佛是回复到了历史原点：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后又要回过头去搞新民主主义了。但实际上，这种看似“回复”与“重现”，不过是历史经过一个大的螺旋之后，在一个更高历史上升阶段的否定之否定。是的，它绝非历史的简单重复，它是在一个全新历史视野、全新历史高度上的新民主主义升级版，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在几经迂回曲折后的历史大飞跃。

由此可见，既然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势在必然，势在必须，势在必行，那么与其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其消极应付，与其放任自流，与其一筹莫展，从而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愈来愈被动，倒不如因势利导，

<sup>68</sup>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2-735页。



用共产党自己独具的传家宝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来凝聚民心，从而将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领导权，将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主导权，牢牢地操在自己手中，并以此来大大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如此一来，用马克思主义严整历史唯物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因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必然性认识的自觉性，从而便使自己具备了领导中国进行有序的制度——市场经济 + 宪政民主 + 多元思想 + 公民社会——转型的主导权，并进而自然而然地在这个转型中更新和提升了自己在中国的执政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基于其所主导的民主宪政转型而获得的政权合法性，是对 1949 年中共革命法统合法性的继承、更新和升级。因此，在未来由中国共产党所主导而转型成功后的宪政中国，中国的任何政治势力均得受制于转型新宪法及其背后的立宪精神，据此也就自然不具有了在任何意义上可对此前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和执政史进行政治清算合法性。不仅如此，在由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民主宪政转型成功后的中国，毛泽东作为开国之父，邓小平作为改革之父，以及中共的某位转型之父——是谁？现在还不知道，但我希望是习近平——还将永远受到中国世世代代的敬仰和纪念，而不管他们曾经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

总之，走宪政必由之路，这是顺应历史必然性；由中国共产党来主导宪政转型，这是发挥主动性、驾驭历史必然性。有了这两条，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冲出历史周期律怪圈，就一定能下出一盘长治久安的活棋，就一定能立于不败之地了。

## (五) 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声音

诚然，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生前种种“反官僚化”的举措，均以失败而告终。现在看来，就其原因，则在于他们都不适当地排拒了整个人类文明中那作为特权文明天敌的资本主义文明，老想另辟蹊径，欲速不达。用中国的成语，这叫“画虎成犬”；用俄国的谚语，这叫“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则是：“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sup>69</sup>。

是的，作为后来者，我们今天似乎轻易即可找出列宁、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干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和“错误”。可是，如果你明白，科学理论并不直接就是工艺图纸；如果你明白，连马克思、恩格斯本人，都曾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犯过急性病；如果你明白，在整个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根本就缺了东方落后国家革命这一大块；如果你明白，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成功地领导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夺得政权后，究竟该如何遵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而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迄今还是一大空白，那么，你就应明白，列宁与毛泽东，从而老一辈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所走过的那深一脚、浅一脚的密密麻麻的脚印，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又是多么弥足珍贵了。

诚然，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对落后国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未能走到这一步，即提出：共产党不仅可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还可以领导资产阶级共和国，故而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理论，就还只能在苏版马列教科书中那超时空的“社好”、“资

---

<sup>69</sup>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坏”意识形态禁忌中，踟躅徘徊。

然而，邓小平却曾不止一次地提起过，要把因种种原因他们那一辈人无法解决的问题，留待后人去处理。或许，习近平前任们最大的失败，就在于他们以“和谐”为由，不敢去触碰那些前人留下的棘手问题，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去突破理论和实践中的禁区，尤其是不敢去触碰那个如何才能在制度上保证中国共产党走出千年“农民造反-王朝轮换”之历史周期率这一敏感问题。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西马”）对苏俄“马列主义”即斯大林主义持批判态度，尽管“西马”在近一个世纪里对打破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宗教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放性和多元化，作了既深且广的探索和开拓。但说到底，无论“西马”还是“新马”，则通属在资本主义制度业已建成，且现代化文明业已高度发达时代的产物。因此，它们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语境，它们剖析现实和批判现实的实践，均与东方后发国家所处的前现代语境和实践，根本就不处在同一文明阶段上。因此，将西方后现代的病灶，搬来类比东方前现代的溃疡，将“西马”或“新马”<sup>70</sup>开出的药方，拿来疗治中国的痼疾，就难免囫圇吞枣和隔靴搔痒了。

此外，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口实下，以西方工具理性的逻辑和术语，为东方的前现代文明拒绝退场作价值理性辩护，甚至还直接求助于中国儒表法里的千年国粹，以此来向世界推销“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权”。这类由某些留洋海归们为投上所好、别出心裁而熬出来的“心灵鸡汤”，均不过是企图用东、西方文明的相对性，去否定人类发展各阶段文明进步的绝对性，均不过是企图用高阶文明的弊端去否定低阶文明有其提升之必要性而已。凡此种种可说是刻意扬短避长、以丑

---

<sup>70</sup> “新马”即新马克思主义的简称。

为美的“形象整容”，看似华丽炫目，但积以时日，却势将会把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文明竞争软实力，导向一个归根结底将彻底丧失其竞争力，永远落后，甚至被淘汰出局的死胡同。

还有，中共党内一大批自称“两头真”的老党员，由于他们过去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均统统来自苏版马列主义，于是，今天苏联模式轰毁了，他们头脑中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也就跟着轰毁了。他们肯定社会党人的成就，但却并不认为那些成就与唯物史观有关，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反而老是拿着放大镜，企图从老年恩格斯那里，找出对马克思的所谓“修正”，并以此去解读“修正主义”的合理性和马克思主义的荒谬性。可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除非你能证伪唯物史观，证伪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质的规定性，否则，拿任何马克思主义的次级理论、应用理论来说事，均属文不对题。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还是其政治学中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均无一不是可以随着实践的广狭深浅，随着时空的不同而有所发展、有所修正的。总之，乍看上去，他们的思想前卫得很，也解放得很，但实际上，在不是将修正主义解读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背离这一点上，他们的认知起点却恰恰与苏版马列主义一脉相承，毫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只是在“好得很”与“糟得很”的价值判断上，彼此刚好颠倒了一下而已。

而中国的左派，则将如今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通体腐败危局，一股脑儿地推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上，似乎只要回到毛泽东那条路线上，这一切便统统不会发生。可他们压根儿就想不到或不愿去想，正是毛泽东当年否定资本主义文明权力制衡而建立起来的那一整套官本位的吏治（干部）制度，正是毛泽东当年满怀理想、兴无灭资、拔苗助长而又无法无天，才为今天中国的吏治腐败、为官僚

特权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留下了积重难返的体制性祸根。

至于“社会主义宪政”论，鉴于其大前提就是囿于苏版马列主义教科书中那超时空的“社好”、“资坏”价值符号，而刻意回避了理论的彻底性品格，故尽管它在“顶层设计”的技术活儿上颇为用功，但由于它始终不愿正视：1）没有资本主义文明的孕育，社会主义文明将无从发生；2）宪政文明首先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是资产阶级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3）整个苏俄东方版“社会主义”，均无一不是以明天之视野反今天之现实来开始，而最终却落得个开历史倒车，以昨日旧文明反今日新文明而告终。如此一来，“社会主义宪政”理论的前瞻性与功用性就锐减了。

所以，现在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了。

东方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对苏俄“十月革命”所代表的那条将社会主义从科学又倒退回空想的东方革命大弯路，进行痛定思痛反思的马克思主义。

东方马克思主义，是高举历史唯物主义旗帜，高举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正视人类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不容省略、不容绕过、不容跨越和不容抹煞的马克思主义。

东方马克思主义，是旗帜鲜明地宣称东方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不仅要领导本国的新型资产阶级革命，还要领导本国的新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防止宗法专制皇权文明复辟的马克思主义。是坚信只有这后一个任务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才算最终完成的马克思主义。

东方马克思主义，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力求避免原始资本主义的血腥，力求在高起点上改造地引入当代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不仅能驾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怪兽，还能驾驭资产阶级宪政文明这个怪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的资本主

义文明大海中游泳，又绝不迷失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方向的马克思主义。

一言以蔽之，东方马克思主义（“东马”），就是东方后发国家共产党人干新型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东方后发国家共产党人干新型宪政民主转型的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站在历史唯物论的高度，既不是从抽象人性，也不是从神灵天启，而是从资本主义文明不可抗拒之历史必然性来阐发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明后发中国的崛起，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马克思主义，除了东方马克思主义，还能有谁？还可能有谁？

由此可见，这种基于历史必然性的后发优势，这种自觉地从文明比较之相对性与文明进步之绝对性的结合中，而走出来的“中国模式”，有谁能不承认？谁又可能不承认？

所以说，中国模式就是东方马克思主义模式，中国话语权就是东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如此一来，“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权”，无须自吹自擂也会自动找上门来了。

然而，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营垒内部，一个健康理论探讨机制的建立，也更胜过一打正确理论的存在。

本来，对于建国后的道路该如何走？对于何谓马克思主义？何谓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即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东方共产党人打得天下后如何坐天下？对于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东方共产党人，不仅可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还可以领导资本主义宪政文明建设，……这一系列尖锐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在共产党内部，有着这样或那样不同的理解，有着这种或那种分歧、异议、乃至争论，这均无不属正常，无不属常态。它既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应当定于一尊。然而，这对用暴力革命夺得政权，对先于西方共产党人掌握了



国家机器，并又对多元文明很少或毫无感性认识的东方共产党人来说，它却是一个长期未能很好解决、且至今让人困惑的大问题。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还有南共、波共、匈共，……，都曾有过将党内认识分歧政治化，将党内政治矛盾敌对化、残酷化、乃至血腥化的痛苦教训；且有的——如朝共——还至今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东方各国共产党夺得政权后抛弃历史唯物论的一个直接恶果，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多元政治文明，完全没有一个批判地继承的总体把握：只看到竞争政治之弊，却看不到竞争政治之利。由于完全排斥多元文明，于是便发生了如此吊诡的现象：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允许异端的马克思主义存在，而“社会主义”国家却不允许马克思主义的异议存在。这在毛时代如此，在邓时代也如此，且迄今亦然。

于是，处在这样一种无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对邓小平来说，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传统一元化文明中，又谈何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谈何对夺权后的国家建设理论作进一步探索？如此一来，又怎能不对东方革命实践中的大弯路付出数代人的惨痛代价？

我们知道，文革的发端，是以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为主轴的。如果说，当年刘少奇的治国理念因其一直受到压抑，而未能充分地以某种完整形态呈现出来的话，那么，邓小平的治国路线，则在这后三十年的中国，有着它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于是在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便终于已可以同时摆放着毛路线和邓路线，摆放着这样两个比较完备的不同治国理念，这样一左一右的治国参照系了：它们的共性和个性；它们分别的发生、发展、鼎盛与衰退；它们各自的成功、徘徊、经验和教训：毛路线以反右见长，邓路线以反左起步；毛路线重理想、邓路线重实际；毛路线重公平，邓路线重效率；毛路线重工农，邓路线重菁英，……，二

者互为前提、互为因果、互相惩罚、又互相补充。

然而仔细比较一下毛路线与邓路线，却不难发现，双方均各自含有部分的真理。但在过去六十多年里，人们看到的却是，这两条路线中的任何一方，又都有着一种将自己手中的那部分真理无限放大，且推向极致的内在冲动。当年，“反右运动”撤掉了右派制动阀，毛路线便开始了那一路狂奔的全国全面大跃进，直到持续三年的大饥荒和大规模的饿死人，才被迫停车，被迫调整；而如今，“粉碎‘四人帮’”打掉了左派制约，邓路线更畅通无阻地走向特权飙升、公费奢靡、官民对立、天价维稳、……，直到眼下已动摇党本国本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通体腐败，才被迫重提“历史周期率”，被迫承认“亡党亡国”的现实危险。

事实上，六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左一右两条路线，不仅丝毫谈不上互补，也从来没有过互补。相反，二者却总是在互斗、互惩、互损和互践中，把对方当着阶级敌人来打，且迄今亦然。中国民间今天正在彼此恶斗着的左右两派，不过是其在党外的缩影：“一个个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sup>71</sup>如此一来，两条路线的恶性互动，其结果便是无可挽回地分别都走向了登峰造极的极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从而也为对方的东山再起和取而代之，行了一个恰到好处奠基礼。如此互为因果，两个三十年，算是走了一个轮回。如果说，当年好高骛远的毛路线一路反右下来，恰好为低调务实的邓路线奠定了党内外民意基础，那么同样，今天实用主义的邓路线发展到极致，难道不也正在为持平民主义的毛路线卷土重来，创造着党心和民心前提？

然而平心而论，无论是“解放”之初的毛路线，还是“第二次解

<sup>71</sup> 参见曹雪芹：《红楼梦》第七十五回

放”后的邓路线，在它们分别登台之初，又都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是凝聚起国人共识，激发起了国人希望的。至于曾经生气勃勃的毛体制后来竟走向了民生凋敝；当年痛定思痛的邓体制如今竟走向了官权腐恶，应当承认，这些却并非毛、邓的初衷，亦并非中共体制的初衷。

如今需要深入探讨的是，究竟是一只怎样的看不见的手，使得中国共产党这左、右两条路线、两种本可互补、互惠的治国理念，最终都无可挽回地走向了两位政治强人良好愿望的反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共性，使得毛、邓两种体制均殊途同归，竟然都徘徊在那历史周期律的边沿？三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三十年即走向当初良好愿望的反面，这说明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以及他们分别所带领的两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治党治国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上，一定还存有某种内在的缺陷。

不妨试想一下吧：假如当年庐山上，以彭德怀为首，包括张闻天、周小川、黄克诚、李锐、田家英、……等一大批名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实为真话务实派，能组阁替代毛泽东为首的一帮浪漫乌托邦左派，但同时又对下台的左派们不搞任何残酷的政治清算，那中国将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图景呢？至少，刚开始蔓延于中华大地的“人祸”饥荒会嘎然而止，其后林彪的“个人崇拜”之风也吹不起来，当然就更无后来的文革风暴了。尤其是，如此一来，中共干部之对人民负责高于对党负责的政治伦理将得以确立；更为根本的是，无论何人，干砸了，就下台，就靠边，就当配角这一类崭新的、健康的竞争机制，将会在中国显露其雏形，……。

同理，如果后来以邓为首的党内右派当政后，对党内外的左派们，能超越个人恩仇、超越左右恩仇、超越路线恩仇，不将党内路线斗争，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当作反革命来对待；能做到网开一面，不赶尽

杀绝，从而让党内一直有个“毛左派”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么，中国共产党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就再怎么腐败，也不至于腐败到如今这种病入膏肓、天怒人怨、难以收拾的地步，不至于腐败到如今这种全然抛开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抛开共产主义理想的地步，不至于腐败到如今这种将中共与人民的关系，倒退到了几乎水要覆舟的地步，……。

这就是在党内保留对立面的益处，这就是在体制上容忍异端的好处。从一定意义上说，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当他们一派独大时，就都往往是非理性的、疯狂的、甚至有时是穷凶极恶的。只有当两派势均力敌、且相互制约时，双方才可能是理性的、通融的、和审时度势的。所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都只看到异端思潮、异端派别对于政令之碍手碍脚、效率不彰的消极面，却从未体认到异端制约还有着促使体制自我纠偏、自我止损、从而让系统获得自我更新之整体优势的积极面。由此便完全可以这么说，两个三十年代的历史均不无残酷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前后两位政治强人，都因噎废食了。

所以，不是别的，正是由于没有制约、尤其是从未建立起一种体制的制约或制约的体制，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内的毛、邓两条路线、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即使其各自毫无偏差地按照最初所确定的同一方向运转下去，其体制运转的惯性和惰性，也会毫无阻碍地将其带向极端、带向反面。历史也确实证明了毛、邓两条路线，及其左、右两种治党治国的政治体制，均最终走向其初衷的反面，给党和人民带来了苦难，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苦难。这可说是毛泽东、邓小平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最大的失败。

不错，在文革后期，人民怀念周恩来、怀念彭德怀、更怀念邓小平。至今还有人不时提起当年在树上挂上一个小瓶，来表达其内心“树

小平”的朴实情感。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当年“怀邓”的最高潮。乍一看来，这中国老百姓一忽儿怀念右倾的邓小平、一忽儿又怀念左倾的毛泽东，这还真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其实，对发生在人民群众中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社会心理现象，只要稍微抽象一下就不难看出，无论人民当年的怀邓也罢，还是今天的怀毛也罢，其整个社会心理的运行逻辑和运行方向则完完全全是同一和恒定的：它们均不过是中国老百姓以自己素朴的直觉方式，无论是此时此刻还是彼时彼刻，均殷殷期盼着体制内能有另一种健康力量能站出来对当今苛政弊政有所制约罢了。可见，中国人民昔日的怀邓与今日的怀毛，丝毫不矛盾，完全符合社会心理逻辑。换言之，这种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几乎是带有某种周期性的社会现象，岂不正好反映出：权力制衡文明这种历史必然性，正在通过中国人民对体制内的非主流派，寄予着这种或那种希望之偶然性，而一再顽强地、生动地表现出来吗？

是的，历史不容假设，但历史却有教训。今天摆在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面前的，已经不是去争论毛泽东或邓小平，左倾或右倾，毛路线或邓路线，谁个正确、谁个高明这一类比较低级的问题了；也不是要对中共党史、乃至国际共运史，就一定得采取或虚无、或掩饰的选边站态度了；更不是要追究任何领导者的个人历史责任——就像如今无论是中国的左派还是中国的右派们都正热衷于干的那样，而是要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用历史必然性的视觉，去检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之前、后两个三十年所走过的轨迹，让毛路线与邓路线能从过去那种有你无他、你死我活的内耗恶斗低级版本，尽快地更新升级到优势互补、良性竞争的高级版本上来；是站在毛与邓那均不无悲壮的既成功又失败的双肩上，扬弃毛邓、又超越毛邓。

而真正的超越，则是制度的超越。

事实上，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所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就合法地存有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并各自办有自己的机关报。这种传统一直为当今各国社会党所沿用。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当初也是多数派（俄语：布尔什维克）与少数派（俄语：孟什维克）合法共存。中共党内虽然因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而从无党内合法派别生存的空间，但至少它在“八大”以前，党内还是有较为认真的票决制的。不仅如此前的历届党代会，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基本上都还是循政策检讨、辩论后的票决途径，而且即使在如“四、一二事变”后的“八七会议”和“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这类危急关头，也没有因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严峻而“不搞争论”，而“稳定压倒一切”。相反，会上仍然是不同的思想、政策激辩交锋后依票决行事。在延安，作为一线领导人的毛泽东，为了抵制莫斯科的瞎指挥和驳斥党内居主流的国际派，也为了赢得党内的多数，他写过大量以理服人、平等探讨的漂亮文章和作了许多精彩的演讲。尽管此刻也发生了围剿“野百合花”，镇压王实味这一类开中共党内压制公开批评之滥觞的事件，但总起来说，党内那时还未形成一言堂、家长制。这从当时发生的中共高层联手干涉毛、江婚姻，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费尽唇舌说服同僚投王明的票，以及 1948 年东北战场上的林彪与西柏坡的毛泽东开展的“军事学术”电报大论战<sup>72</sup>等事例中，均可窥见一斑。

诚然，开放党内多元化，让反对派合法存在，党的领袖就不可能靠权势吃饭，靠“钦定”吃饭了。这么一来，党内不同思想的交锋、不同派别的竞争，就不得不遵循一套公开的游戏规则，党内民主才不至于是一句空话了。既然党的领袖只有靠多数拥护才能坐稳位子，那么党的政策若有重大失误，他也就只好下台承担责任了。其实，下台

<sup>72</sup> 至于将此事定义为“林彪反毛主席军事路线”，则是 25 年之后，即 1971 年“913 事件”后的事了。



就一定是坏事？毛泽东建国后要真有机会被选下台，说不定是他的大幸，也是中国共产党之大幸。实际上，作为毛泽东思想璀璨瑰宝的军事思想部分，难道不都产生于当年他倍受打击、屡遭罢官后的逆境深思？同样，邓小平 1980 年代初以“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谁能说不是萌动于他在江西拖拉机厂的钳工台旁？还有，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后来的被迫赋闲，也自会使得这前后两任总书记，均会更深沉地去品味这架他们也曾参与建构过的一元化机器之种种弊端的。

据陆定一回忆，至少在中共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有鉴于缺少制约机制的惨痛教训，中共曾正式议论过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的问题。文革中也曾盛传过毛在该会上的一条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的语录：“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至于后来中共为何终于没有允许党内反对派合法存在，这可以让党史专家们考察去。但仅此起码已可说明，开放党内多元化，允许党内不同派别的合法存在，却并非就必然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而今天中国的左派、毛派若能正视它，思考它，中国共产党若能正视它，思考它，才能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一条既区别于西方、又区别于老路的新路。

## 结 语

毫无疑问，作为一种以探索历史规律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其本身并不创造任何规律，从而，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即使它掌握到了历史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sup>73</sup>其实，无论是西方社会党国际的成功，还是东方共

---

<sup>73</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01 页。

产国际的失败，无论是列宁、毛泽东当年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还是夺权后干社会主义的失败，其全部奥秘，均正在这里。

事实上，我们今天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亲切地感受到唯物史观的理论魅力，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体会到历史必然性之不可抗拒、从而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阶段之不可逾越，难道不正是因为我辈站到了列宁、毛泽东的肩上？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献身的那场伟大的社会试验并非毫无价值？毋庸置疑，倘若没有老一辈共产党人在人类寻求自身解放事业的崎岖道路上，百折不挠地探索，哪怕是失败的探索，我辈今天就仍旧还会沉浸在那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跨越、绕过、省略、忽略的无尽黑暗中，还会在那个“造反-皇权”的千年历史怪圈中，左冲右突，盲目摸索，直到再次头破血流。

是的，正是老一辈布尔什维克、老一辈共产党人，用他们英勇牺牲和流血奋战，用他们辉煌成功和悲壮失败的双肩托负着我们，才使得我辈今天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切地重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理论魅力：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sup>74</sup>

因此，中国共产党若不根据“十月革命”以降东方革命的失败，痛定思痛，回到唯物史观，回到科学社会主义，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所突破——即：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地夺得政权后，还须自觉地领导整整一个时代的新型资本主义制度、新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以此来抵御本国那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专制

<sup>74</sup>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皇权文明的复辟，——那么，数代老一辈共产党人当年洒下的热血，就难免付之东流了。

我们今天纪念马克思，就是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要旗帜鲜明地保卫历史唯物主义，保卫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今天纪念马克思，就是要反对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尤其要反对那种以小农社会主义始，以封建社会主义终的东方版空想社会主义。

我们今天纪念马克思，就是要旗帜鲜明地与统治中国思想界大半世纪的苏版马列教科书中的唯心史观，作彻底的决裂，走历史必由之路，在承认和顺应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驾驭这个历史必然性。

我们今天纪念马克思，就是要毫不含糊地与那种禁锢和窒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元化学风决裂，开放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来研究。

总之，毛泽东当年突破左倾机会主义的禁区是艰难的、也是伟大的；邓小平当年突破新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禁区，同样是艰难的、也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分别有着这两个时代的伟大突破，才迎来两次“解放”翻天覆地的旧貌换新颜。

然而，旧的突破又会产生新的禁区，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任务。那么在今天，习近平能不能带领他的新团队、带领整个中国共产党，扬毛、邓之长，弃毛、邓之短，更尤其防两短之叠加和放大，而在这个新的时代又有新的突破呢？

让共产主义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让科学社会主义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让马克思主义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批判武器，让历史唯物论永远指导中国共产党走历史必由之路！

完稿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纽约